

新制度与大革命

——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教育为中心

THE NEW REGIME AND THE GREAT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EDUCATION IN CHINA

叶赋桂/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新制度与大革命

——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教育为中心

XINZHIDU YU DAGEMING

YI JINDAI ZHISHI FENZI HE JIAOYU WEI ZHONGXIN

叶赋桂/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刘明堂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制度与大革命：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教育为中心 /
叶赋桂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 - 7 - 5041 - 4577 - 2

I. ①新… II. ①叶…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6415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19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0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3 千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新制度与大革命》自然让人想起《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确，托克维尔的名著令每一位读者都难以忘怀。他湛然古井的才情，行云流水的文字，洞悉入微的思想，还有他对法兰西的深厚情感，对历史的惊人预见，对自由的珍爱激赏，都深深地感染了我。就学术而言，最让我倾倒的还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独到的解释，以及他“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的研究和写作方法。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从以往的事物中自动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反宗教，但到大革命后，法国和欧洲的基督教会无一不振兴；法国的中央集权并不是新制度的产物，而是法国的传统，大革命使法国发生了巨大惊人的变革，但有些东西却任由惊涛骇浪而不消失……如果把这些观点移植到近代中国，估计也是一篇篇精彩的论文，至少比“市民社会”、“经纪模式”之类更切实些。但我不准备这么做，实际上是托克维尔点燃了我研究中国革命的学术热情，但同时也迫使我既超越又沉潜。超越是要摆脱其具体观点，超越西方学术对中国研究的殖民和霸权；沉潜是要扎根于中国，沉潜在本土的实际中，不以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肆意解释中国，而从中国社会本身概括和抽象出学术观点。

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状态表面上一片繁荣，实则令人忧虑，知识分子和学者缺乏独立的思想，学术的创建，或委身于当道，或匍匐于西学，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在当代中国就像五四时期一样热热闹闹。在这种更强大的西潮席卷之下，更在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之中，中国学者连学术独立的意

识都没有了。当今的中国研究很像近代蔡元培、胡适等人所担忧的，中国研究的中心和权威不在中国，不在北大、清华，而在外国，在哈佛、密歇根。外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引用中国学者的著作并不多，倒是中国学者满篇都引用外文和翻译作品。中国的论著和博士论文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为研究基础的很少，而大量的都借用外国学者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这种状况若不改变，中华学术的独立和文化的复兴从何谈起呢？

从中国社会本身立论就要抛开从西方历史总结出来的概念和社会发展模式，就不要用西方历史理论来框架中国历史社会，然后削足适履地修正以自圆其说，而需要饱含对中国的敬意和同情，以冷静的理智，精湛的学术，实证地探究和解析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从而彻底摆脱近代以来各种传教士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歪曲和偏见，真正获得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客观、中正、公允的认识和理解。这一方面接续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生命，一方面使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和认知自我，重建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品质。

一

近代中国研究常被分成一个个时段，如晚清、民初、五四等，每个时段中学者们常常又只专攻一点，不及其余，或洋务运动，或维新变法，或辛亥革命，或五四运动，或国民政府，或共产主义革命，将各时段及其历史事件关联起来进行研究的并不多。但像我这样问学与读书一样“散漫”的人，做“专家”总勉为其难，更何况我觉得近代的演进，乃至直到今天的走向，历史进程是环环相扣的。我甚至觉得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结构性地被框定了，这不是什么历史的规律，而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注定的命运。

寻找和发现近代中国的命运，就不能把眼光盯在一点上。当我将晚清与民初相对照，一一排比分析时，竟惊奇地发现，晚清所赞赏和追求的，在民初却是要批判和否定的，在晚清作为近代的因素，在民初却变成异化或反动的力量。晚清作为近代化动力、备受推崇的军人和军事、商人和资本主义在民初却成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新的学校和教育不能为民族和民众带来新文化，培养近代人才，却训练出反政府的革命者；国家的政体和

国体错乱，共和变党国，民主成独裁。

那么，这种异化或反动的成因是什么呢？无疑，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的关键。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性及其表现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和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研究了古代和近代知识分子，但一般都绕着批判性、人格、知识、传统与现代等打转，既发明不出新义，也没有获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准把握。在我看来，要达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确切理解，不在于研究个别和数群知识分子的思想，更不在于研究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人生道路，对近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关键也不在于传统与现代，而在于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来审视知识分子。而一旦将古代知识分子与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上的作用进行考究辨析，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长期稳定和发展，而近代中国则动乱和革命不止。

实际上，自近代以来，无论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或纵之无度，或禁之无间，或摇摆不定，不知适从，其关键原不在于某一党或某一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的问题恰在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定位。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知识分子自身，还是所有的党和政府，一直都没有把握好，没有像在古代中国一样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找到正确、适当、妥帖的位置。结果知识分子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政府和民众不知如何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政府、民众与知识分子几方不是过了，就是不及，常常措置失当，引发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这其实不是思想和政策的问题，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就算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就将迎来新的辉煌与荣光。

二

曼海姆早就指出，连接知识分子的唯一要素是教育，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教育也早已成为一个共生体。在精心设计的恢弘有度、妙到巅毫、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特别是通过选举制度与教育制度，政府、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意识形态、思想和价值观化合为一，有效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即使政治动乱，王朝更替，人民起义，外族入

主，社会结构也仍延绵不绝，固若金汤。

近代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平衡器，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中国近代教育既没有在政治上培养出国家公民，也没有在经济和社会上培养出具有近代知识和技能的普通和专门人才。近代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更无从谈起，基本上是阶级的再生产，却没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不畅，精英循环，而在一个社会动乱和大变革的时代，精英循环是甚为少见的。

但近代中国教育最失败的还不在民众的教化，而在精英的塑造。教育权的失落导致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危机，教育的分崩离析导致国家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分裂互斗。因为教育由不同的主体所办，教育体系不同，教育目的、人才培养目标、方法手段等大相径庭，结果教育所赋予知识分子和国家精英的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国家精英之间、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在观念、思维和行为上的不同，彼此又不能相互理解、协商和妥协，因此形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兵戎相见。

近代以来，政治人物、思想家、学者都批评中国民众素质低下，因此民主难行。这如果不是借口，也是谬论。中国民众的素质其实并不差，只是批评者的立场和用心有问题。而且民主的关键也不在民众的素质，而在精英的素质。正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精英不理性，少宽容，不合作，少妥协，而导致民主不张，动乱不歇。

三

中国近代化的器物—制度—思想的解释模式流行很久了，但实际上这一解释粗糙而不确切，如果硬作此解，也许猴子拣西瓜模式更贴切些。看到坚船利炮，拣起来；看到军事、工商、教育等，拣起来，但坚船利炮渐渐忘了；看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拣起来，但教育、行政等制度抛在一边，军事、工商更被扔到脑后；看到思想、文化、国民性等，拣起来，但视政治无足轻重；然而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国民性改造，闹腾了半天，也不见什么效果，知识分子只能黯然收场，让出历史的舞台。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作为有关。与古代知

识分子重在建设不同，近代知识分子批评有余，建设不足。近代知识分子对政府不满，对民众也不满，对现实不满，对传统也不满，总是批判一切，看不起一切，唯独对自身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然而，近代中国不要说没有形成德国和法国近代的思想和文化高峰，产生康德、歌德、席勒、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式的人物，就连泰戈尔、甘地也难得一见。究其原因，恐怕在于近代知识分子只知紧跟如白驹过隙的西潮，潮来潮去，潮涨潮落，而缺少深刻的思考和理性的创见，更关键的则可能在于对中国传统缺乏必要的吸收和弘扬。而当近代知识分子获得无边的自由，却没有创造出什么之后，自由就一时难再得了。

近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让人太息不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深重苦难，经过无数次的惨痛失败，经由几代人的牺牲奋斗，中国才重新踏上富强文明之路。但也许这是中国的天命所在，天降大任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故以困顿挫折考验之，艰难苦恨磨炼之，刀兵国耻砥砺之，以曾益其所不能。而最终，中国定要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强盛均富、文明礼义之邦，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的灿烂辉煌，并引领人类文化的前途和方向。

但为此，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一个涅槃。虽然现在我们批评近代知识分子的保守和闭塞，但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还不如近代知识分子开放和开明，与商人相比更是大不如也。当我们的商人已经在全世界开疆拓土、征服全球时，我们的知识分子却还在龟缩在小我的世界中；当我们的商人已经具有21世纪的眼光和胸襟时，很多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识却还定格在19世纪；当我们的商人把中国的产品乃至制度输向全世界时，我们的知识分子却连输出的想法都没有，仍一味地吸吮着西方快要枯萎、干瘪而苦涩的乳汁。中国知识分子要想为自身和中国创造未来，就不要自囿于小我，匍匐在西方的脚下，而应昂起首来，满怀信心，雍容大度，以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视野，以博大开放的胸襟，复兴中华文明。

为此，中国文化必须有新的创造。这需要认真研究和反思近代以来的历史，发挥传统的力量和智慧，倾力将西方文化的精华吸引过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代表人类前途和未来的中华新文化，亦即人类新文化。这一态度和方法，其实就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四

学有天性，又有至情，更兼功力，托克维尔的研究和写作方法令我倾倒，当然关乎我的性情和学术生涯。在我木讷呆板的语言行为背后，澎湃着心灵的激情和思想的激荡。我因此热衷于思想史，那种高妙遐思常常令人神游忘怀，发现前人思想奥秘时那种与智者对话的愉悦以及灵光闪现中的自我激赏和自得之情更是让人迷醉不已。然而，每当我任思想的野马恣意驰骋时，总有某种力量要把我拉回到坚实的土地上。

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游走在教育学与思想史之间，又常常到诸多学科那里去串串门。教育学其实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学术水平低下，那只是因为一些很烂的研究影响了学术观瞻，但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哪个学科都有类似的情形，只不过教育学多了点而已。思想史也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么高深学问，实际上没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太多了，没有历史的思想史研究更不在少处。我曾自道：“若从心所欲，当为思想史之述作；然为稻粱谋，得从高等教育之研究”，而知识分子问题不但使稻粱之谋合于心之所欲，并且因思想史与教育学的结合获得善解其事的学术利器。

近代以来的学术是一种高度学科化的活动，而我这种学术游侠的行径当然就破除了学科的门户。不过，我这样做并不是要赶当下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的时髦，而是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研究的学术发展所内在要求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长期受到余英时先生太深的影响，而且研究者大多是思想史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我对知识分子的兴趣其实也是余先生激发的，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仰着脖子来看余先生及其书。但随着我对《史记》、《汉书》、《新唐书》等读得越多，就越对纯粹思想史的知识分子研究充满疑虑。我日益强烈地感到观念先行的学术危险，仅以个别人的言论和行为来标签整个知识阶层的特性更是相当不切实的，历史的进程与逻辑的推演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统一的。知识分子研究只有在社会史的支持下，才能救济思想史研究的缥缈恣意、凌空蹈虚。而离开了教育，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同质性，如果没有教育学的支持，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必然是不完整的。因此，本书力求把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融为一体，综合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五

本书的思考、研究和写作前后算来整整十年。2000年我完成博士论文《近代教育与近代知识阶层 1840—1922》，虽说当时亦颇得好评，但我始终觉得有要义未发，因此我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教育一直保持着持续的阅读、观察和思考，到2007年基本形成了本书的用心与主旨、问题与思路，然慵懶已惯，杂事且多，2009年方完成全部的修改和写作。

因为研究的时间拖得很长，用心和主题又有变化，写作中有的地方笔随意走，汪洋恣肆，有的地方躊躇再三，不能下笔，文字和论述前后会有或些微或显著的差异。这其实倒也真实地映射出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观感和观念的变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问题和研究我已触及，但未能深究，或不见诸本书，就只好说书虽成，意未尽，且待来者了。

为学为文都有一种特别的愉悦，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由痛苦而磨炼的愉悦，这一过程恰似陶渊明描绘的桃源之行：先是“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因此，“欲穷其林”，但时时又感到“林尽”，“不复得路”，幸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乃试图另辟蹊径，“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房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于是“怡然自乐”。

学术有大美，有至乐，但为学问道的过程却总是明暗交替、苦乐相伴的，然个中滋味，俱“不足为外人道也”。或谓“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看来学问可精，文章难巧。我的学问文章见于本书，其利钝巧拙就由读者道之了。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近代社会、知识阶层与教育	31
第一节 传统社会结构的变革	31
第二节 传统知识阶层的状况	45
第三节 近代教育与知识分子	52
第三章 军人知识阶层与教育	59
第一节 军功官僚的崛起	59
第二节 军人的知识化	68
第三节 教育近代化与军事教育	76
第四节 军人与近代教育	94
第四章 商人知识阶层与教育	106
第一节 商人知识阶层的崛起	107
第二节 商人的知识化	119
第三节 实利主义教育	135
第四节 商人与近代教育	144

第五章 文化人知识阶层与教育·····	156
第一节 文化变迁·····	157
第二节 传统知识阶层和教育的变革·····	166
第三节 近代教育与知识阶层的兴起·····	179
第四节 文化人与近代教育·····	202
第六章 新制度与大革命·····	214
第一节 军·····	215
第二节 商·····	222
第三节 学·····	231
第四节 政·····	238
第七章 近代教育与知识分子·····	252
第一节 近代教育下的知识分子·····	253
第二节 近代知识分子·····	271
第三节 新旧制度下的知识分子与教育·····	281
第八章 结 论·····	291
后记·····	305

第一章

导 论

一、缘起

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中的斑斓而迷人的现象，它如此斑斓，在不同的时空下折射出光怪陆离之状，它如此迷人，引得无数人沉溺其中，痴迷不已。正如博格斯所言，“知识分子现象既复杂，又常常非常微妙，在工业发达国家尤为显著”^①，其实，知识分子现象在中国至为微妙，自古而然，于今为甚。

分析知识分子现象，当然首先要把握知识分子的特性。但知识分子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却是一个始终没有解答又总是不断被人解答的问题。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难以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内聚力的阶层，但唯一连接他们的要素是教育。^②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断，也是一个很精辟的论断。不管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多大差别，但他们都是教育的产物，教育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因此，研究、认识和理解知识分子最基础最关

^① 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

^②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6页。

键的就是教育，透过教育的棱镜能折射出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性，找到知识分子的基因。教育是破解知识分子现象的密码，是解答知识分子特性的钥匙。

然而，在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很少有人从教育的视角来分析，特别是在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上。另一方面，在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对如此重要又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这是思维的盲点，学术的偏狭？还是学科的壁垒，研究领域的局限？似乎都是，又似乎不全是。但不管怎样，要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教育，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就必须把知识分子与教育结合起来研究。

相映成趣的是，在古代知识分子研究和古代教育研究中，学者们似乎自觉不自觉地做到了这点。在士或绅士研究中，学者们无不将之与教育融为一体来研究。最典型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学者们都视春秋战国为中国古代士的兴起时期，而士的兴起及其特性则又与教育（特别是私学）内在地关联着；教育史的研究都把春秋战国看作是古代教育发展最关键的时期，而论春秋战国的教育，必然要论及士阶层的兴起，并将士阶层的兴起看作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勃兴的历史条件和基本要素。研究秦汉以后的中国绅士，是断然不能不讲科举和学校的，至于研究秦汉以后的教育，若不谈知识阶层，是肯定说不明，道不透，讲不清，论不深的。

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教育，学者们都将二者合起来讲，而无论在思想史、社会史还是教育史中，近代知识分子与教育的研究却彼此回避着，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实际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近代教育的产物，近代教育塑造和刻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性。不可否认，与古代知识分子一样，近代知识分子受到政治等的强大影响，但在起源和根基上，自然是近代教育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性格、思想和行为。而当我们的探索深入到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实际中，进入近代教育活动的深层和方方面面时，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社会阶层中至为重要的势力，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中始终居于决定性的核心地位，是影响和决定中国近代教育和社会的重要力量，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和观念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和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和特点。因此，无论研究中国

近代教育，还是研究近代知识分子，都不能把二者分开讲，而应当将二者合起来讲。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果说在特质上内在地与近代教育相关联，那么，在功能上则鲜明地带着革命的光环。关于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探讨可以说贯穿着整个 20 世纪，不但是学术上的，更是实践中的。但到 20 世纪快要结束时，中国社会和学术界顿然响起“告别革命”之声。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在中国不同的政治和学术派别之间、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无可否认，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锋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如果近代知识分子具有如此强烈的革命性，而知识分子的特性又内在地与教育相关，那么是中国近代教育在根本上培育和塑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吗？

二、概念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并不都是清晰的，而存在着诸多歧义。因此，在着手分析问题之前，为了论述的方便和准确，须对这些概念作明确的界定。为更好地揭示这些概念的意义，本书通过制度、革命和知识分子研究的学术谱系进行概念的推演和归纳。

1. 近代教育

在历史研究中，“近代”、“近代史”、“近代教育”、“近代思想”等不断地被频繁使用。那么，“近代”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关于“近代”的条目下有两个义项：①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 19 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②指资本主义时代。^①

若“近代”是一个时间名词，按照较普遍的看法，就指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段，与其相对的是“古代”。则“近代教育”就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660 页。

不仅包括近代的新式教育，还应包括近代的旧式教育。若“近代”是一个形容词，则其所指就是“近代化的”、“近代性质的”、“具有近代特征的”，与其相对的就是“传统”。不同含义的“近代”，“近代教育”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在本书中，“近代”基本上是在形容词的意义上使用的，如近代商人、近代军人、近代学校、近代教育等。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和行文的需要，本文间或也会在时间意义使用“近代”概念，特别是在与古代对举时。在本书中，“古代”这一时间概念，其所指为春秋战国到19世纪中期这一时段。近代则涵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①

因此，与“近代教育”相对的就是“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建立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适应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以宗法制为特征的社会之上的，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和制度。传统教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也是古代社会的教育模式。但在19世纪中期后，传统教育因为历史的惯性而延续下来，仍然存在，且与近代教育相竞争。但随着近代教育的发展，传统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渐渐消失了，不过，传统教育的精神依然余音缭绕。

顺便一提的是，本书之所以以1840—1922年为研究的时段，是因为1922年的新学制是中国教育史的关键节点。另外从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而言，20世纪20年代初也是一个关节点。胡适认为中国现代思想约以1923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个时期是“集团主义时期”^②。换一个角度来说，太平天国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的改革和革命是上层阶级的，而自五四运动以后，下层群众则不断卷入到改革和革命中。先是城市的学生、工人、市民，接着是中国人民的主体农民。而一旦所有的人民都参与到改革和革命中，现代化的性质就不同了，时代的潮流也不一样了，历史的阶段自然前后两分。而就教育而

①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近代以来争论很大，特别是社会分期更引发了多次论战。以前教育界也以社会发展史的分期为教育发展史的分期，而对教育自身的内在属性相对忽略了。本书就论题的范围和理论要求在时间上作了一个限定，并不涉及历史分期的问题。有关历史分期的讨论见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玉法《现代中国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现代史论集·总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等。

② 《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257页。

言, 1922 年当然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节点。不过, 在行文中因为历史事件自然的性质, 不会严格以 1922 年为限。

2. 新制度

就像当代中国社会的泛经济主义一样, 近年来中国学术也明显地表现出泛经济主义的色彩, 一说制度, 就是经济学的制度, 如果要是说到新制度, 更是马上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但本书中的制度和新制度并不是当下时尚的经济学概念和经济学流派, 因此与什么企业理论、产权、成本、交易费用、选择、博弈论等了不相干。

制度因为在各个学科中都被广泛研究, 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制度的知识谱系。斯格特在总结各种学科有关制度的理论后认为: “制度是多重的、持久的社会结构, 由符号因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组成。”^① 制度包括调控的、规范的和文化认知的三大要素体系 (见表 1-1)。但不同的学科和理论强调的要素体系不同, 经济学家强调调控要素, 早期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强调规范要素,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认知-文化要素。^②

表 1-1 制度的三类要素

	调控要素	规范要素	文化-认知要素
服从的基础	权宜之计	社会义务	理所当然
命令的基础	规章制度	共同期望	构建的图式
机制	强制的	规范的	模仿的
逻辑	工具性	恰当性	正统性
指标	规则、法律、认可	证书、鉴定	共同信仰、共同的行为方式
合法性基础	被法律认可	受道德支配	在文化支持下得以理解和认知

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Table 3. 1, p. 52

^① 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 49.

^②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pp. 51-58.